



吳汝鈞
編著

佛教大辭典

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

吳汝鈞 編著

佛教大辭典

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

根據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《佛教思想大辭典》重印

FOJIAO DA CIDIAN

佛教大辭典

編 著 者	吳汝鈞
出 版	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 (北京東西南大街 85 號 郵政編碼 100703)
印 刷	北京新華印刷廠
經 銷	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
版 次	1992 年 7 月台灣第 1 版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書 號	ISBN 7-80103-005-2/H·5
定 價	36.00 元

冉雲華教授序

在認識這本辭典的編著者之前，我早於臺、港的出版物中，閱讀過汝鈞的部分撰著或譯作，對他的好學慎思、明辨與勤寫精神，都非常欣賞，印象頗深。西元1981年5月，我從英國劍橋到日本去作研究的另一段工作時，途經香港，小住數日，才初次與汝鈞會晤。通過多次長談，我對他的勤奮治學、精密研究，特別是紮實的基本工夫，有更深一層的了解。承他言及那時他已經用了近十年的時間與工夫，正在編寫一部中文佛教思想大辭典時，曾使我驚訝不已。使我驚訝的是近來大多數的青年學者，於決定從事學術研究時起，就想一步成名、有所成就，不肯甚至於不屑去做基本的紮實工夫。現在居然有一位青年學人，在研究與撰寫之餘，肯用一己的力量作這種吃力而難討好的工作，實在令我感動。

早從開始研究佛學時起，我就曾深深感到由於中文的工具書數量很少，有的更內容貧乏，使初學者常有無從下手之嘆。當時大家常用的參考書，只有丁福保氏所編的《佛學大辭典》(1921年初版)一種，有助於佛學研究而已。但是那部辭書，源於日文《織田佛教大辭典》，雖然出版以後風行一時，開現代佛學辭典編纂之風，但它畢竟出版於七、八十年以前，不可能利用近數十年出版的研究成果。其他的同類書籍，如《實用佛學辭典》等，只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，對深入研究佛教的人士，用處不大。偶爾也有一兩種參考物，初看書名及內容條目，好像是具有相當深度的專門辭典。可是如果要解答疑難時，辭書對那一條目的細節，只是引用經文而已；而其所引的經文，正好是讀者讀不懂才查辭典的

那一部分。因此所得的結果，不過是使人啼笑皆非。

近十數年來佛學研究在許多國家中，都有進展，而日本學者的成就更是傑出。這一點可以從日文辭典的編輯與出版中，得到充分證明。例如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(增補版)、池田大作監修的《佛教哲學大辭典》、中村元的《佛教語大辭典》等，都是有深度而又自具風格的鉅製。用中文出版的辭書，近數十年來也有多種問世，其中不乏內容充實、編輯謹慎、印刷精美之作。例如大陸出版的《宗教辭典》(1981年出版)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哲學》(1987)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宗教》(1988)，以及臺灣出版的《中國思想大辭典》及《中國思想百科辭典》等，都給予相當比重，闡解佛教名相。可是這些辭書都不是專門研究佛教，仍然無法滿足佛教學者們的需要。只有近年臺灣出版的《佛光大辭典》(1988年初版)，才是一部最新的大型佛教辭典。但是這部辭典的性質，是屬於百科全書型的工具書，因而其所包涵的條目，內容廣泛，卷帙頗大，長達七百萬字，翻閱自然不大方便。

《佛光大辭典》也是一本長達百萬字的巨著，但如與前面所提到的中、日百科全書式大辭典相比較，此書只能算是一本中型而專於哲學性的參考書。它不但可以解答一般佛學讀者的難題，對深入研究佛教思想的人士，更有具體的參考作用。正如這一辭典的書名所表示，本書的編纂是有選擇的：以內容而論，它的重點在於佛教思想；以文化地區而言，則取印度與中華為主要對象。

佛教是世界三大主要宗教之一，有著長遠的歷史與廣博的內涵，特別是復雜、深邃而細緻的教義。在其從印度出生、成熟到衰亡的過程中，已經聚集成很豐富的文化遺產。及傳入亞洲各地之後，又與不同文化圈相結合，從而與當地的語言、文字、思想、儀式、藝術、民族及政治社會等，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想要對佛教的全部內容，詳加詮解，就是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書，恐怕也難全其功，難盡其事。由於佛教的

內涵是既廣且深，再加上外涵的復雜文化層面，使讀者在使用參考辭書方面，很難對博、深兩種要求，同時滿足。又因為過去研究印度佛學的人士，有許多不懂中文；而專注於中華佛教的學者，大多不通印度古典語言。其結果是研究東亞佛教的專家，很難知道佛教思想的形成經過，找不到源頭，也難確定問題的性質。另一方面，學習印度佛學的專家，也無法理解佛教在傳入東亞之後所得到的新生命力與文化內容。《佛教大辭典》的出版，正好補足了這些方面的缺點——可以使學習東亞的佛教學者，通過本書而溯本趨源，找到佛教概念的語文基礎、思想層次，及其在宗教哲學上的涵義。與此同時，讀者們在閱讀印度佛教名相以後，還可以看到條目衆多的中華佛教的特有概念，由此理解佛教入華之後有什麼創造發展，以及其所表現出的生命活力。

△在條目處理的方法上，本書的編著者採取了哲理與文獻學雙軌并重的方針，這是一種比較紮實的治學方法。一般而論，參考書很容易流入兩種偏向：一是屬於“學而不思”型的——其特點是照抄原典，看不出編者的風格，有時甚至無法理解條目的意義；另一種可以用“思而不學”概括其特點——編者天馬行空，長篇大論，就是不注明其所討論是否屬於佛教思想。哲理與文獻學的并重，在很大的程度上解決了上述的這種困難，既能說明哲學理論，也能點出經典根據，從而使“思與學”重新得到平衡。這一特點在書中的主要條目中，都可以看到。

△編纂大部頭參考書的另外一種困難，是人多手雜，文字很難有統一的風格。在這一點上，本書的編著者作得非常成功，所有的條目定稿，由他一人執筆，文字風格前後一致，使由其引起誤解的可能性，大為降低。編寫辭典還有一個困難：材料太多，篇幅有限，編者很難發揮其本人的創造能力。在這種創造性上，過去最出色的當推熊十力氏的《佛家名相通釋》(1936年出版)。但是那本書所收的條目不多，並且在語言及其他研究資料的吸收方面，都受到時間、語文等方面的限制，無法滿足

今天的學術要求。本書的編著者在這一點上得到了熊氏的啓發，並且在撰寫方法、作者創見與別人研究成果的利用等三個方面，都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新學術水平。讀者如果查閱辭典中所收的重要條目，如“空”、“十二因緣”、“阿梨耶識”、“阿賴耶識”、“中道佛性”、“法界緣起”等，並且以此與最近的研究出版相比較，就會看出編著者在某些重要的題目上常有創見，也利用了現代佛學研究的成果。

佛教自漢代傳入中華，與中華文化傳統經過了數世紀的衝突、調諧、吸收與醞釀，才在隋唐之際完成與中國文化的結合，從而形成了一種新型與更有生命力的大乘佛教。不但一度是中古時代亞洲東部的主導思想，也對宋、明理學，特別是陸、王心學的形成，提供了重要的養料；並且在清末民初的啓蒙思想中，還繼續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，產生不小的影響。可惜近數十年以來，中華的學風有的著重於近代西方的實驗主義，有的一專於社會經濟及唯物思想，有的沉迷於物質享受，有的只管科學技術取消人文價值；更有少數人士視佛教為“異端”或迷信。因為這多重原因，佛教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，對中國歷史的貢獻，對日常社會生活的影響，似乎已被多數人所不重視了。

無可諱言，今天的中國佛教有許多令人難以滿意之處。但是好歸好，壞歸壞，瑜固然不可以掩瑕，同樣的瑕也不應該掩瑜。也正是因為這一理由，佛教在現代中國，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，但並沒有真正衰亡。而佛教的哲理與實踐方法，在世界範圍內，已經受到更多人的注意。許多人正在嘗試用佛教來解決某些現代人的問題，更有人提倡以學術研究淨化佛教。所有這些努力都需要以學術研究為基礎，而學術研究的推進必需提高工具書的水準。我懇切的希望本書的出版，能夠對佛教思想的研究，產生其應有的影響：便利學人，促進學人研究興趣，提高學術水準，帶動新的研究工作。

我與汝鈞相交已有十年，知道他用心之苦，用功之深，用力之勤，

與潛力之富。並且有幸在這部辭典的編撰過程中，數次閱讀了部分的原稿或校稿，深覺其對研究佛教思想，特別是印度與中國的佛學，都是非常有用。故於本書印成之際，寫出所感向大家介紹。希望才華學博的學者們，大家共同努力，俾使中華佛學研究，能夠在中國人的文化圈內，有超越現狀的大豐收。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，大家重視並且自己下手作基礎研究工作，使更多的中國的學術研究能夠達到世界水平。

冉雲華

1990年10月於臺北寓中

自 序

佛教思想精深而又博大，是一門大學問。這學問所論究的，是究極的真理，和如何體證它，俾能從現實人生的苦痛煩惱中脫却開來。故佛教實是真切的生命學問，吾人若能滲透入其中，必將受益無窮。但佛教經論浩繁，其中又多艱澀的名相與術語，以現代人的思想背景，去發掘這些經論的精義，并不容易。這本《佛教大辭典》的編著的動機，便是希望在這方面提供一切助力。即是，以流暢的語言媒介，配以現代人熟悉的詞彙，適切地詮釋佛典的詞彙，把佛教義理展示開來。這種富有現代意義的佛學辭典的編纂，是我的理想。實際上能做到多少，便要請讀者來評定了。

由於辭典的重點是在思想方面，故所選取和詮釋的條目，只限於在佛教經論出現的名相與術語。關於專有名詞，例如人名、書名、地名、寺院名等等，限於個人的精力，只能割愛。不過，有很少量的專有名詞，由於能反映佛教思想的某些特色，故破例選入。而在名相與術語方面，我所選取的，基本上是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者，亦有少量是西藏地區的佛教者。至於日本佛教的名相與術語，因非自己所長，故未有選入。在詮釋的詳略方面，通常來說，思想性或哲學性強的名相與術語，如十二因緣、空、阿賴耶識、愛、不思議解脫等，詮釋較為詳盡。思想性或哲學性弱的名相與術語，如有關戒律與淨土信仰方面者，則詮釋力求簡略。

辭典的編著，基本上以文獻學與哲學雙軌并進的方法來進行。關於

這兩種方法的詳情，請參閱拙著《佛學研究方法論》(學生書局，1983)；其運用亦請參閱拙作《佛教的概念與方法》(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)。總的來說，文獻學方法強調文字上與文獻上的根據。在辭典中出現的名相與術語，都取自漢語大藏經，但佛教的根源在印度，不在中國，故對於重要的名相與術語，我盡量提供梵文、巴利文方面的表述式，有時并加上西藏語的翻譯式。另外，在能力範圍內，有時也對一些重要的名相與術語的梵文表述式，加以分析和解釋，從文字學上顯示該名相或術語的本來意思。例如對於“rūpa”(色)的處理。另外，在解釋名相與術語的同時，又盡量適量地引述大藏經中包含該名相或術語的敘述，并詳細地注明出處，俾讀者能依據查考。至於哲學方法的運用方面，我基本上是把佛教思想或佛學當作一種具有高度價值的哲學來看；因而在詮釋重要的名相與術語時，會盡量點出其哲學涵義。如《大乘起信論》的心真如、華嚴宗的真如本覺，與天台宗的中道佛性，雖然在具體方面有不同指涉，但在哲學或形而上學方面，有一個共通點，這即是視心與理為一的思路。這實是佛教式的心即理的表示式，具有深刻的哲學涵義。又如天台宗的性具觀念，表示作為真理的佛性或法性本質上即具足諸法，談論和實現真理，必須扣緊諸法。這實是一種泛真理論，也顯示極其重視世間法的態度，對現實予以全盤肯定。佛教(大乘佛教)是很入世的。

現在謹簡述辭典編著的經過。自1972年夏天起，我開始進行這項工作。最初是挑選佛教的名相與術語，搜集資料，撰寫初稿。在1974年至1978年間，我到日本與德國留學，在學習之餘，仍不斷撰寫，并把日本與歐美方面的現代佛學研究的成果吸收入辭典中，這主要是日文、英文和德文方面的資料。初稿於1979年春完成。其後數年，我在香港教學與閱讀經論，進一步充實自己。在這段時間，我生活在半閉關狀態中，幾乎與外界斷絕往來。在1983年夏至1986年夏間，我又到北美洲留學，在學習之餘，把初稿整理一遍，此中包括辭典條目的增加與

刪削，和詮釋方面的修正與補充。1986年夏回香港，又把手稿進行第二次整理，此中的工作，與第一次整理的，大致相同。不過，我把自己年來對佛教義理的一些新的體會，特別是中觀、天台、華嚴方面的，都大量地補充進去。最近才整理完畢，這算是定稿了。總的來說，辭典的編著，由初稿到定稿，歷時十五年。

以下要對這部辭典所牽涉的參考與研究資料，交代一下。這可分兩方面。其一是原典的文獻，另一則是現代佛學研究的資料。關於原典的文獻，自以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為主。所選取的條目，和在詮釋中的引文，都直接來自這部藏經。另外，我也運用過《續藏經》和少量梵文原典，如月稱的《中論釋》(*Prasannapadā*, ed.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, *Bibliotheca Buddhica*, IV. St. Petersburg, 1903—13)和《心經》(*Hridayasūtra*, in Edward Conze, *Buddhist Wisdom Books*. London: George Allen & Unwin, 1980)。前者附有《中論》的梵本。至於現代佛學研究資料，則曾很廣泛地參考與運用。此中包括日文、中文、英文和德文四方面的資料，其中尤以參考日文的資料為多。以下謹列舉其中較重要者。

a. 日文資料

中村元：《佛教語大辭典》(3冊)，東京書籍，1975。

多屋賴俊、橫超慧日、舟橋一哉：《佛教學辭典》，法藏館，1974。

宇井伯壽監修：《佛教辭典》，大東出版社，1960。

荻原雲來等：《梵和大辭典》(1—16冊)，鈴木學術財團，1940—1974。

駒澤大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：《禪學大辭典》(3冊)，大修館書店，1980。

梶山雄一、上山春平：《空の論理：中觀》，角川書店，1969。

- 服部正明、上山春平：《認識と超越：唯識》，角川書店，1970。
末木剛博：《東洋の合理思想》，講談社，1978。
北川秀則：《インド古典論理學の研究》，鈴木學術財團，1973。
三枝充惠編：《佛教思想第二卷：認識論、論理學》，理想社，1974。
西谷啓治編：《禪の古典：中國》，築摩書房，1974。
柳田聖山、梅原猛：《無の探求：中國禪》，角川書店，1969。
佐藤哲英：《天台大師の研究》，百華苑，1961。
田村芳朗、梅原猛：《絕對の眞理：天台》，角川書店，1970。
中村元編：《華嚴思想》，法藏館，1975。
坂本幸男：《大乘佛教の研究》，大東出版社，1980。

b. 中文資料

- 牟宗三：《佛性與般若》(2冊)，學生書局，1977。
牟宗三：《現象與物自身》，學生書局，1975。
唐君毅：《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》卷三，新亞研究所，1974。
湯用彤：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(上、下)，中華書局，1963。
吳汝鈞：《佛學研究方法論》，學生書局，1983。
吳汝鈞：《佛教的概念與方法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。
吳汝鈞編：《梵文入門》，彌勒出版社，1984。

c. 英文資料

- Conze, E. *Materials for a Dictionary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*. Tokyo: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, 1973.
Hattori, M. *Dignāga, On Perception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8.
Inada, K.K. *Nāgārjuna: Mūlamadhyamakakārikā*. Tokyo: The

- Hokuseido Press, 1970.
- Monier-Williams, M. *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*. Oxford, 1899.
- Nagao, G. "On the Theory of Buddha-body". *The Eastern Buddhist*, Vol. VI, No. 1, May 1973.
- Nakamura, H. *Indian Buddhism*. 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1987. (First Edition: Japan, 1980)
- Ng, Yu-kwan. "The Arguments of Nāgārjuna in the Light of Modern Logic". *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* 15 (1987).
- _____. "Chih-i and Mādhyamika". A Ph.D. thesis submitted to McMaster University, Jan. 1990.
- Robinson, R.H. *Early Mā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*. Madison: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, 1967.
- Sprung, M. *Lucid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Way*. London and Henley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, 1979.
- Stcherbatsky, Th. *Buddhist Logic*. 2 Vols. Bibliotheca Buddhica, X X VI. St. Petersburg, 1930, 1932.
- Whitney, W.D. *Sanskrit Grammar*. 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1973.

d. 德文资料

- Dumoulin, H. "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Ch'an nach Hui-neng im Lichte des Wu-Men-Kuan"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VI, 1941.
- _____. *Zen: Geschichte und Gestalt*. Bern: Francke Verlag, 1959.
- Frauwallner, E. *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*. Berlin:

Akademie-Verlag, 1958.

Vetter, T. *Erkenntnisprobleme bei Dharmakirti*. Wien, 1964.

在以上所列舉的資料中，就佛教文獻學方面來說，我從中村元的《佛教語大辭典》和多屋賴俊、橫超慧日、舟橋一哉的《佛教學辭典》中獲益最多，茲謹志明，并向這四位學者致謝忱。至於對條目的哲學的解釋方面，則有少量是參考時賢的高見，亦有不少是個人的意見。一般來說，佛學辭典的編著，由於要照顧眾多的條目，故有篇幅上的限制，不能對條目作很詳盡的詮釋，因而不易表現創意。這本辭典基本上亦不能例外。不過，對於很多特別重要的名相和術語，能反映某一學派在理論立場上的特點的，例如天台宗的中道佛性、一念無明法性心，華嚴宗的法界緣起、相即相入，禪宗的狗子佛性、不昧因果等等，我還是作了較詳盡的詮釋。這種做法，主要限於中觀、唯識、天台、華嚴與公案禪方面，這是我自己認為比較熟悉的佛教學派，其義理的哲學性也較濃。我的詮釋是否有創意，則要請高明來指教了。

一般來說，綜合性的佛學辭典，由於條目繁多，所涉之面亦廣，因而在編纂辭典時，編纂者常不能不參照現成已有的同類作品，因而很多佛學辭典，在選取的條目與詮釋方面，常有雷同之處。例如上面提到的《佛教語大辭典》、宇井伯壽監修的《佛教辭典》和織田得能編纂的《佛學大辭典》，相互間便有不少雷同之處。這是勢所難免的。這本《佛教大辭典》基本上亦不能例外。不過，由於這本東西多年前已成初稿，而最近幾年，我比較多讀天台宗與華嚴宗的文獻；在研讀中，常把補充新的條目置在心頭。因此便一邊讀這些文獻，一邊錄下自己認為重要的名相與術語，而加以詮釋。其后把這方面的所得，都收入辭典中。因此，在這本辭典中出現的天台宗與華嚴宗方面的條目，特別是天台宗方面的，很多都是現成的佛學辭典所未收錄的。這種一邊研讀原典文獻一邊隨手錄下重要的條目，而加以詮釋的做法，當然是最好的。但佛教文獻浩如

煙海；爲了編纂一本佛學辭典，而要讀盡所有文獻，自是無可能的。我在這裏所能做到的，只限於天台與華嚴的文獻而已。

我研習佛學與有關語文(梵文、巴利文、西藏文、日文、德文等)，到目前爲止，都在學院中進行。在這些學院中，曾很幸運地得到很多老師、學者的有用的指導。我一邊研習，一邊編著這本辭典。儘管這本辭典還很粗疏，但若沒有這些老師與學者的助力，還不會成爲這個樣子。他們包括：香港中文大學的故唐君毅教授、牟宗三教授，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的寺村秀夫教授，京都大學的頓宮勝先生、小林信彥教授、服部正明教授，京都學派的阿部正雄教授，定居於京都的西藏喇嘛卡爾生(Kalsang)上師，德國漢堡大學(Universität Hamburg)的邊爾(O. Benl)教授和加拿大馬克馬斯德大學(McMaster University)的冉雲華教授。在這裏我謹表示對他們的感謝。我也必須感謝日本政府、德國政府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，它們分別頒給我文部省獎學金、DAAD學術交流獎學金，和研究院獎學金，使我能到日本、德國和加拿大留學，吸收日本、歐洲和北美洲在佛學研究方面的方法與資料。這些方面的好處，都反映在辭典中。我也必須一提新儒學宗師故熊十力先生。他雖非宗佛學，但他對佛教特別是唯識學名相的詮釋，及對佛教的空寂立場的批評(分別見於其《佛家名相通釋》及《新唯識論》)，對我來說，都極具啓發性。猶記取二十年前初接觸佛教原典，讀《心經》至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句，完全不得其解，乃捨般若而習唯識，藉著熊先生的《佛家名相通釋》作輔導，才覺對佛教義理的理解有進境。辭典條目既得定稿，又需編排條目的次序，把條目剪裁串連起來，才能送去排印。排印好又需校對，做索引，這都是很煩瑣的工作。在這方面，除了自己動手外，也得到一些青年朋友和學生的一些助力，特別是香港浸會學院的梁萬如同學和陳玉珍同學。這裏也一并向他們致謝。另外，我要感謝香港浸會學院撥出一份學術研究經費，俾我能請人製訂本書的索引。負責這項

工作的，便是上面提到的梁、陳兩位同學。我更要感謝冉雲華教授為這部辭典作序。冉教授早年在印度留學和工作，其後二十多年來，在北美定居和教學，並常為國外的學報撰寫多篇學術論文。他是以嚴謹的歷史學方法研究禪思想史著稱，而尤精於宗密的思想。他的序言，使辭典增添了光采。

上面說佛教思想是一門大學問。有關這門大學問的辭典的編纂，通常是多個學者經多年時間來進行的。即使是這樣，也還免不了錯誤。例如中村元主編的《佛教語大辭典》，有多個助手幫忙，經三十年才完成，還是有錯誤。（如下卷頁 1250 a 欄解“法界圓融”，該辭典以法界圓融為依華嚴宗十玄六相而說的事事無礙的法界觀，但所引的文獻，却是天台宗的《觀音玄義》與《觀音玄義記》，這便不相應。另外，該辭典以此條目出現於《觀音玄義記》卷 1，大正藏卷 34，頁 892 上欄，實則不是上欄，而是中欄。又同卷頁 1467 b 欄解“和泥合水”，以此詞出自《碧巖錄》第 84 則，但查《大正藏》卷 48 所收《碧巖錄》第 84 則，並無此詞。此外，該辭典還有多處文獻上的錯失，不復盡錄。）現在這部《佛教大辭典》由最初開始撰寫到最後完成定稿，都只由我一個人來做，故錯失之處肯定是有的，而且可能不少。這則要請讀者們原諒了。事實上，為了編寫這部辭典，我個人付出的代價，著實不少。例如，這項繁重的工作，損害了健康，招來了身體上的頑疾；更遺憾的是，它使我對自己的親人不能有應有的關注。不過，想到學術思想的慧命的相續，內心也便釋然。說到學術思想慧命的相續，不免有些感觸，要多說幾句。佛教發源與光大於印度，其後擴張開去，流布至中國、朝鮮、日本、蒙古、東南亞，以及於歐美。這些地域大抵都基於原始佛教的緣起、空的基本立場，發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佛教體係。不過，就思想的深度、廣度與理論的嚴格性言，似乎只有中國佛教能與原來的印度佛教相比肩。這在天台宗與華嚴宗的文獻中，表現得很清楚。特別就對世間的態度言，天台宗強調功

用，華嚴宗強調力用，再加上禪宗強調作用，都表示同一積極的態度，要在世間起用，要轉化世間，所謂“出假化物”。這種對世間的積極態度，實是印度大乘佛學的不捨世間的精神的進一步的開展，而富有現實意義。這實是思想上的一個大寶山。可惜的是，近代中國佛教的學術思想，一直遲緩不前，國人似乎不見這個大寶山；天台、華嚴的文獻，和大量的禪籍，都成了古典而被人遺忘。印度佛教的原典也少人留意。在這方面，若與東鄰的日本相比較，便非常明顯。此中的原因，自有很多。其中一個重要的，是缺乏現代意義的佛學辭典，作為閱讀佛教原典的輔導。在這個意義下，我們這部《佛教大辭典》，或許能起些補救作用。不過，我希望這本粗疏的作品，在這方面只是一個開始，以後會有更多學者從事這種工作，編著多些優秀的現代意義的佛學辭典或佛教思想辭典，在接續以至推展中國佛教的學術思想的慧命方面，作出有用的貢獻。

1987年夏於香港渣甸山，初稿

1990年秋於同地，定稿